

历史复盘

反围堵前沿“广交会”先声

文/陈柏坚 黄启臣

1951年3月,“第一届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”在广州市举行。在此前举行的全国贸易会议华南预备会议上决定:为配合包括广州在内的华南

政商并肩 击破封锁

从1950年至1952年底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,广州主要依据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等国家政策方针,以及1950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通过的《对外贸易暂行条例》规定,开展对外贸易。具体做法有:

一是选择、登记广州辖区内的508户私营进出口商,批准它们经营进出口业务;二是规定在“先进后出,进出平衡”的原则下,把易货贸易作为主要外贸形式,包括直接易货及记账、联锁、对开信用证等。对进出口货物按准许、统购、禁止三类划分;三是实行许可证制度,所有进出口货物均须经过审价后,再按次颁发的许可证放行;四是实行外汇管制办法,即出口货物必须按规定期限向国家银行结汇,外汇由国家统筹使用。

因此,在允许私营进口商自备外汇进口货物的情况下,实行进口批汇措施,即必须按规定期

公私合营 转向苏东

1952年至1958年,是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改造时期。广州按照国家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,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”的过渡时期总路线,开展了这一改造。首先是把资本主义的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,其次是再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进出口企业,也就是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。

由于私营进出口商受到限制,经营比重下降,国营比重上升。据统计,1953年第四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,广州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,私营比重从原来的超过72%,下降到26%左右,国营比重则相应上升。

1956年后,随着行业公私合营

地区开展外贸,介绍进出口商品,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,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,由华南区财委和外贸局等35个公私机构和团体,组织广州、海口、潮汕、粤中等多个地区和湖南、广西公私经营单位,合作举办这

次展览会。首次举办的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,汇集了全国各地农副业、工业和手工业、畜产品及矿产品等2000多种,绝大多数直接由广州口岸出口。其中最著名的有象牙制品,包括山水、人

物、牙球、印章、筷子等品种,因独具东方特色,制作精巧,成为外国人收藏观赏或馈赠亲友的珍品。可见新中国建国初期,广州的出口商品以农副土特产为主,手工业和轻工产品其次,主要进口产品是工农业用器材和农药等。

长:1950年占近25%,1951年占近72%,1952年占69%。

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,由于广州私营进出口商力量较弱,要与港澳商户保持相互投资、借贷关系。因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、禁运,广州与远洋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比重很少,主要跟港澳地区来往,其次为东南亚国家。

近6600万美元,比1953年增长近3%,占广东全省出口额55%。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,农副土特产品出口比重有所下降,轻纺等工业品的出口比重逐年增加。缝纫机、针棉织品、新闻纸等“杂品类”增长数倍,缝纫机已成为出口超千万美元的产品。五金、矿产、化工医药、机械、仪器等产品从新中国初期无出口或少量出口,发展为较大量出口。

1957年前后出口苏联、东欧、朝鲜、越南、蒙古等国家的比重,从1952年的近7%增长到超过46%,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,主要是港澳、其次为东南亚、中东和日、英、法、意、西德等的出口,从1952年的93%下降到45%。

作者曾分别担任暨南大学、中山大学教授,合编《广州外贸史》。



1956年11月,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,次年4月改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,简称“广交会”。

从1950年的508家,增加到1951年的647户,资本额也从1903万元(相当于当时全市商业资本的一半),增加到2477万元。1950年至1952年,批准进出口总额合计77752万美元,其中进口56988万美元,占73%以上,出口20764万美元,占近27%,广州口岸出口额占广东全省总出口额近58%。这时,国营进出口经营比重逐年增

长:1950年占近25%,1951年占近72%,1952年占69%。

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,由于广州私营进出口商力量较弱,要与港澳商户保持相互投资、借贷关系。因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、禁运,广州与远洋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比重很少,主要跟港澳地区来往,其次为东南亚国家。



晚清广州地区所产丝线装运上船出口世界各地。

当时比较典型的企业有“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
据统计,1957年广州年出口额

上接《E1

直到1854年,受太平天国战事波及,广东红巾暴动,紧邻广州、棉纺织业发达的明清“天下四大镇”之一佛山镇遭遇战火,纺织工业摧残殆尽,“棉花遂无销路,而英制棉纱,乃乘机

物、牙球、印章、筷子等品种,因独具东方特色,制作精巧,成为外国人收藏观赏或馈赠亲友的珍品。可见新中国建国初期,广州的出口商品以农副土特产为主,手工业和轻工产品其次,主要进口产品是工农业用器材和农药等。

长:1950年占近25%,1951年占近72%,1952年占69%。

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,由于广州私营进出口商力量较弱,要与港澳商户保持相互投资、借贷关系。因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、禁运,广州与远洋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比重很少,主要跟港澳地区来往,其次为东南亚国家。

近6600万美元,比1953年增长近3%,占广东全省出口额55%。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,农副土特产品出口比重有所下降,轻纺等工业品的出口比重逐年增加。缝纫机、针棉织品、新闻纸等“杂品类”增长数倍,缝纫机已成为出口超千万美元的产品。五金、矿产、化工医药、机械、仪器等产品从新中国初期无出口或少量出口,发展为较大量出口。

1957年前后出口苏联、东欧、朝鲜、越南、蒙古等国家的比重,从1952年的近7%增长到超过46%,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,主要是港澳、其次为东南亚、中东和日、英、法、意、西德等的出口,从1952年的93%下降到45%。

作者曾分别担任暨南大学、中山大学教授,合编《广州外贸史》。

约》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、资本渗透的合法地位,又通过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(1895—1898年)的三次大借款,进一步控制了

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(1871—1876年),广州红茶出口量平均每年为89000多担,到了

总的来说,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(1895—1911年),即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,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继续着复苏势头,贸易额激增,进出口总值从1895年的4950万关两,增至1910年的11550万关两,突破了一亿两大关,增幅高达450%左右。造成这种明显复苏态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:

首先,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商品倾销。同治到宣统年间,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,它们不仅加紧了对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,还开始对华输出资本,并划分势力范围。这40年间,西方列强及东亚“新贵”日本,通过《马关条

贯通苏伊士 远连旧金山

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,两项重大工程有效地促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愿望。

外国资本设立的众多洋行,如英资怡和洋行、丹麦慎昌洋行、美资美孚及德士古火油公司等,直接垄断中国及广州的对外贸易。有人当时这样说过:“华商丝厂之资金,往往借贷于洋行,听取其操纵。洋丝商任意选择标准,规定价格。”

在广州兴办的外洋洋行、运输业、银行业共同构成对广州外贸的把持,它们互相联手、共同进退,掌控了广州外贸的主导权。有广州本土人士曾揭露说:“在其背后,本国领事为之运输信息,船业公司为之料理转运,保险公司为之担保损失,本国银行为之融通资金,驻外代理为之招徕主顾,无怪乎洋行永能操纵本身生丝对外贸易之权力。”

当然,19世纪70年代,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,商办的民资资本主义工业在广东应运而生,主要有机器缫丝、制茶业、造纸业等,它们为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,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,也生产了更为充足的货源,对1870年至1911年间的广州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增长,有直接的促进作用。

法轻易抹去。自有鸦片贸易以来,广州就是此项贸易的一个中心地区,直到1850年,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鸦片交易的最大市场。当年的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说过,鸦片在中国的消费“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/5,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/5”。

咸丰八年(1858年),中英《天津条约》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,鸦片进口数额列入海关关册中,而入册数值显然比实际入册数要少得多。香港更由此成为东亚地区最大集散地,珠江三角洲密布的河网中有许多民船在走私鸦片,海关根本无法统计。英帝国殖民者作为当年世界上最大的“合法”毒贩,以“自由贸易”之虚名,凭借强悍武力,行贪婪掠夺之实,在华赚得盘满钵满,眉笑颜开,可烽拥而来、无孔不入的毒品却在近代中国陷害无穷,这一笔烂账,该如何清算?

主权渐失 苦涩成长

近代西方来华资本的真正目的,是控制广州进出口贸易实际经营权。

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加紧资本输出,这些投资集中在银行、运输、进出口贸易等行业,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广州外贸的复苏和增长,但它们的真正目的,是控制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。以运输业为例,大量外国轮船公司在广州设立并开辟多条航线,广州地区本土船运公司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,以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为例,广州港进本国轮船2725艘,吨位43万余吨,不及同期外国轮、帆船数量的一半及吨位的十分之一。这样一来,广州进出口贸易的运输权便被外国人所控制,造成广州进出口贸易的畸形发展。

更为恶劣的是,列强还大力争夺广州的船运权,迫使清廷签订《中日通商行船条约》及其《续约》(1890年、1903年)、《修改长江通商章程》(1890年)、《辛丑条约》(1891年)、《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(1903年)等一系列有关船运权的不平等条约,迫使中国大门进一步打开,亦使得广州门户洞开。这样更加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,尤其是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。

孔子与祭礼

文/崔志光

阴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,许多佛教的寺院在这天要举行盂兰盆会,超度亡灵;这天也是道教三官大帝中地官大帝的生日,按照道教的说法,地官大帝的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,所以道教的宫观也会举办赦罪超度法会。而在民间,此时农作物成熟,民俗按例要祀祖,用新米等祭供,向祖先报告秋成。

然而,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。我们现在祭礼的观念越来越淡薄,有些在城市生长的孩子,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祭祀。没有去给祖先上过坟,也没有在祠堂烧过香,更别说参加较隆重些的家族祭祀活动了。

和我们现代人不同,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,极为重视祭礼,不是只重形式,而是发自内心的重视。在《论语》中,有多处关于孔子与祭礼的记载。《论语·尧曰》篇是论语全篇的最后一章,也是孔子和孔门高徒对中国政治、文化规律的历史性、总结性的阐发,这章提出“所重:民食、丧、祭”,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三件事。民食就是百姓的吃饭问题,人民的生活、生计问题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是任何时期都要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。丧指亲人间的生离死别,从此阴阳相隔,再不相见,自然是痛彻骨髓。为了表达

这种感情,必须要通过丧礼的形式来寄托哀思。所以,民食和丧其实包括了百姓的“生与死”,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,也是政治的重点,故“所重”理所当然。

可是,祭礼有那么重要吗?《论语·八佾》篇记载: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。子曰:“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”意思是说:祭祀祖先的时候,好像祖先就在那里;祭祀鬼神的时候,好像鬼神就在那里。孔子强调“如果我不亲自参加祭祀,就好像没祭一样。”

这段记录最能说明孔子对祭礼的态度。祭祖先必致其敬,如亲人在世一样,即“事死如事生”,此即感恩心的自然流露,这是孝敬。祭神必尽其诚,不能包办代替,不走过场形式,此即敬畏心的流露,这是诚敬。

可见,在孔子看来,无论祭人还是祭神,其核心不在外在形式,而在内心状态。如果祭祖先而不存念祖先临祭,虚于应付则必心神不恭,身肢散漫,感激之情无以抒发,激励之志无以感奋。祭神如果不是亲自临祭,即使代祭者亦能极其诚敬,而于我心终是欠缺,才会有“祭如不祭”的说法。故孔子虽极重祭礼,然尤所重者,在致祭者临祭时之心。心敬如此,孔子是向祖先和鬼神求福吗?非也。

孔子的态度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他是反对向鬼神求福的。甚至把不加区别一味为求福而乱祭鬼神



认为是谄媚,是淫祀。《论语·为政》篇有:“子曰:非其鬼而祭之,谄也。”夫子明确说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,这是你存心谄媚。这就奇怪了!如果鬼神当敬,就须敬,既要敬,又何必远?如不当敬,就须远,既要远,又安能敬?这岂非自相矛盾?

其实,孔子之所以要远鬼神,是强调在社会生活中“人”是主体。《论语·先进》篇有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。”事是侍奉、相处的意思。这就告诉我们,“事人”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更加重要,“人”离我们最近。尽人事而后听鬼神,自助才能神助,绝不能陷入神秘主义和玄幻体验中,否则就会消极懈怠,而失去人的进取精神,可见孔子是重“人本”的而非“神本”。

为什么又要敬鬼神呢?在《论语·学而》篇“宗圣”曾子曰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“慎终”为“丧”,“追远”为“祭”,如果能做到对死者慎重举行丧礼,并在日后定期举行祭祀、不断追思祖先,那么,社会道德风尚就能够渐渐敦厚起来。原来,敬神是为了“教化他人”。

人能敬,狂慢才能收敛,不安才能释放,才能心灵安定,以此状态做人做事,自然亨通,有若鬼神助之。所以,敬的受惠者不在被敬者而在施敬者。以敬心待人接物,学习工作,皆可裨益身心,造福社会,它其实是教育的一种方式。以此观之,孔子对祭礼的重视,正是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的完美体现啊。

作者为传统文化学者。本文首发于《家族企业》杂志2019年9月刊。